



2018中国国际肝胆外科论坛暨首届华人器官移植大会在京开幕

精准肝胆外科治疗的“中国模式”

▲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贾薇薇



可视化、可量化、可控化精准胆道外科关键支撑技术 破解肝胆外科手术定位、定量、定构难题

董家鸿院士介绍，肝内胆管病变是腹部外科领域跨世纪的难题。经长期肝胆外科临床工作，结合数千例肝胆胰复杂疑难病例诊治经验，董院士团队于2006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“精准外科”新理念，并整合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外科精髓，创立了精准肝胆外科范式，确立了病灶清除、脏器

保护、损伤控制三要素并重的系统化干预策略，构建了以可视化、可量化和可控化为特征的关键外科技术系列，破解了肝胆外科手术中定位、定量、定构和精控的难题，极大提升了肝脏肿瘤、胆道肿瘤、肝胆管结石症、肝内胆管扩张症、终末期肝胆病等复杂肝胆病的外科治疗效果。

董院士指出，目前已有多部基于精准外科理念的胆道外科临床实践指南发布，旨在改变复杂胆道病治疗理念、策略和技术。未来应积极探索胆道生理学与疾病生物学，创新关键支撑技术、核心技术和手术方式，建立基于临床大数据的真实世界研究，开展医工融合临床转化科学研究。

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历程

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教授介绍，在器官移植的发展中，几个重要时刻值得铭记。2014年12月3日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宣布，自2015年1月1日起，中国将停用死囚器官，公民自愿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唯一器官合法来源。2015年10月17日，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全球器官捐献大

会上，理事会全票通过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移植大家庭，结束了中国移植界长期受到排斥和孤立的历史。

黄教授指出，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，形成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“中国模式”，主要包含6个方面：由政府主导；具有法制保障；建立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；制定符

合我国国情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三类标准；实行人道主义救助、荣誉表彰和缅怀纪念政策；形成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器官捐献人文精神。

黄教授呼吁：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，使中国在2020年，实现以一种无可争辩的伦理学方式，成为世界上第一器官移植大国，为世界移植事业做出应有贡献！”

基于肝胆外科解剖学的手术创新史

肝门部胆管癌现代外科治疗奠基人、国际肝胆胰协会前任主席 Yuji Nimura 教授介绍了肝脏手术的发展史。

1888—1954年，人类对于肝脏解剖才开始起步，当时认为肝脏手术是非常复杂、高难、危险的。但是随着科技发展，人类逐渐开始认识肝脏结构，并开展肝脏手术。

Nimura 教授自 70 年

代开始学习肝脏手术，希望了解胆道解剖。当时，经皮肝穿刺胆道造影技术刚刚兴起，开展的主要术式是肝切除和胆道取石术。Nimura 教授和团队根据大血管的胆道造影，初步提出了名古屋大学的胆道分段体系。

80 年代，经皮胆道造影和胆道镜取石术的开展，进一步揭示了胆管结构，并于 90 年代提

出了尾状叶切除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等复杂疾病的方式。90 年代还逐步涌现了段、亚段、肝门区、P 点、U 点等革命性的概念。

近现代，胆管和其他脉管结构的关系得到了格外重视，提出了南绕或北绕型胆管，进一步了解其解剖变异，细化胆管分类，更密切的关注胆道和血管的解剖关系。



开幕式现场

手术切除是肝门部胆管癌最重要、最根本的治疗手段

现代肝脏外科之父、欧洲外科学会创会主席 Henri Bismuth 教授对于汇管区肿瘤及胆道狭窄患者

的治疗展开讨论。

Bismuth 教授介绍了肝门区手术的发展历程。在早期无法对肝门区进行手术操作的时候，外科医生选择在肝圆韧带后方的胆管做胆肠吻合，完成肿瘤姑息性治疗。随后，由于部分患者病情严重，造成左肝萎缩，因此进行了术式创新，利用右侧肝内胆管进行短路手术，但难度明显增大。对肿瘤侵袭范围、肝内胆道的判断也十分困难。

随着技术的进步、胆道造影等一系列手段的产生，使得外科医生可以更好的了解肝内胆道解剖，由此提出了肝门部胆管癌的 Bismuth 分型，并且发

现了尾状叶受肿瘤侵犯的现象，而患者的预后也在逐步改善。同时，血管吻合技术的进步，no-touch 概念的提出与应用，让术后肿瘤复发率进一步下降。

目前，肝门部胆管癌也在开展应用肝移植进行治疗。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化疗和探查，确认能够达到根治效果。

Bismuth 教授强调，对于肝门部胆管癌而言，手术切除仍是最重要、最根本的治愈手段。虽然介入和内镜技术很发达，但外科医生应当在胆道内置入支架前了解患者情况，肝门部胆管癌是一种外科性疾病。而胆道狭窄的治疗，必须坚持黏膜对黏膜的吻合，明确狭窄范围以及正常胆道黏膜的位置，完善分型。由于手术难度大，术中必须充分小心谨慎。

关联阅读全文
扫一下